



“四史”:高校培养时代新人的必修课

文 刘娟 广州体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的学习，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指出：“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党史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近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四史”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教育部决定组织编写“四史”大学生读本，引导大学生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的紧密结合上增进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认识和理解，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在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学史明道矢志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大背景下，当代大学生需要在遵循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学史明道矢志。

首先，大学生要从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双重角度，深刻了解中国共产党近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史、新中国70多年砥砺奋进的发展史、改革开放40多年擘画蓝图的变革史、社会主义发展500多年正道沧桑的实践史。

其次，大学生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入、具体地纵横比较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理解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再次，大学生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学习中华文明史、世界社会主义史、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改革开放实践史，从中汲取中国精神，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明确理想信念和人生选择，把学习奋斗的具体目标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将小我融入大我，做到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

在坚持和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赓续红色基因

“四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的奋斗史与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的红色家谱，社会主义运动实

践交融贯穿其中。大学生作为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肩负着民族的重托和时代的使命，要在坚持和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赓续红色基因。

大学生要做红色家谱的传承者，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来透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要把握好三个注重：注重纵向勾勒、系统研读“四史”材料，从依次递进的历史知识与历史精神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伟大选择的历史认知；注重横向联系、辩证理解“四史”知识，从辩证统一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中理解各个历史知识点的相互独立性及相互关联性，洞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合价值性与合规律性的历史统一，更好地把握历史进步规律；注重突出主线，从贯穿历史进程的主导性实践中突出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主线，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理性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发展趋势，汲取经验把握大势。

大学生要做红色基因的赓续者，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坚定支持者和拥护者。要树立大历史观，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整体的、系统的、历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不能用现实割裂历史，也不能用历史否认现实。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反对

歪曲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史、人民军队史的舆论，反对诋毁国家形象、英雄模范的言行，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做到政治清醒、道路自信。要树立全球史观，正确认识并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政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推动人类文明对话互鉴、交流沟通中凝聚青春正能量。

在历史认知向政治认同的转化过程中涵养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既是一种情感表达，也是一种政治归属，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四史”蕴涵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将家国情怀中的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合力意识融汇成了一股强烈的情感，追求国家统一富强、民族凝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大学生不仅要对“四史”在认知层面形成历史认知，还要在情感层面增强情感认同，在意志层面内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在行动层面外化为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

具体而言，大学生应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作为涵养家国情怀的政治认同基石，将对新中国发展史、改革开放变革史、社会主义实践史的认知转化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价值理念的理性认可与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雕塑作品《艰苦岁月》潘鹤

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大学生要将自身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与路线图中，从思

想上关切中国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从心理上激发广泛而深沉的情感共鸣和真挚情怀，形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自觉认同。



油画《青纱帐里游击队逼突袭》 陈启美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这座石库门房子的一楼，12位正式代表、1位陈独秀先生的代表，还有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科尔斯基，一起召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

这就是中共一大。

算上这13位代表，当时在全国一共只有50多名同志，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成立一个政党，彻底改造中国，把中国推上现代化轨道，洗尽屈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终迈向民族复兴，文明古国再次崛起。

难以置信，但他们是认真的。

其中两位代表，与一位青年密友同行，从长沙走水路，经洞庭，入长江，往东而去，目标上海。两位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青年密友是萧子升——那个曾经跟毛泽东历时月余、步行千里、走遍湖南5县考察农民问题的斯文小伙。

毛泽东在船上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用30年到40年的时间，就能改变中国。他说的“我们”，是指共产党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流血革命的信念，此时已经深植于心。

数年前，毛泽东和萧子升，都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相信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就可以达到一个人人互爱互助的世界。只不过，在湖南与军阀的斗争，以及与五四运动的遥相呼应，让毛泽东对此幻灭，而萧子升却一直固执不懈。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见，在武汉，分道扬镳。

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现代政党，在简陋而动荡的一次“大会”中成立。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起来担当民族使命，作为一个“雪球”的核心，越滚越大，累年血战，用28年时间，打出来一个新的中国。

政党一成立，共产党人就投身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并以此作为最重

要的资本，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帮助它强化组织、建立军队，准备北伐。

北伐的对象，是封建军阀。清朝虽亡，但封建仍在，帝国主义还在，不平等条约还在，中国人民的苦难还在，人吃人的社会还在。不彻底消灭这些魑魅魍魉，共和就是徒有虚名，国家和民族被踩在脚下的地位就永无止境。

中山先生出师未捷身先死，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在共产党人的政治动员帮助下节节取胜。兵锋直指上海时，碰到了几乎所有最强大的列强。

蒋介石投入了列强怀抱，与支持他的苏联以及共产党人决裂，1927年4月12日，用黑社会的力量血洗上海的共产党人和他们领导下的工人，领导上海起义的周恩来，也几乎命丧屠刀。

紧接着，被目为左派的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7月15日，武汉，再次血流成河。

共产党人从6万多人减少到1万人左右，蔡和森、恽代英、赵世炎、罗亦农、彭湃、张太雷、方志敏、邓中夏、汪寿华，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

中国共产党的两大核心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大钊先生，也被押往从苏联大使馆抓出来，处以绞刑。38岁的李先生，眼睛都不眨一下，英勇就义。

恽代英，就义之前豪迈赋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捐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方志敏，身陷囹圄，写下脍炙人口的《可爱的中国》。

共产党人，从此与蒋介石结下深仇大恨。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会上，34岁的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为了消灭

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一味地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妥协，没有出路，这时候的共产党人认识到，消灭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也不能指望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最后可能跟前面两者合流。

想要实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只能依靠共产党自己。会议决定，让毛泽东到湘赣边界，去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

理想不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7年8月1日，江西南昌，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下，就像五四运动和党的一大那样风云际会，林伯渠、叶挺、贺龙、陈毅、聂荣臻、林彪、粟裕、陈庚、许光达、陶铸……一起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

中山先生南下广东，进入汕头，一路血战，损失惨重。周恩来突患重病，孤舟求医香港。朱德率领着不断减员的队伍，再入江西，奋力前进。

秋收暴动风雷骤。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队伍，试图围攻城市，半途铩羽。毛泽东明白了，自身力量太弱，硬拼没有出路，保存革命火种至关重要，于是决定进入粤湘赣三不管的罗霄山脉，在井冈山创立革命根据地。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朱德，带着南昌起义的队伍，闯过枪林弹雨来到了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中国工农红军”诞生了，这是一支人民子弟兵，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代军队。他们从人民中来，为人民而战，心有信念，舍生忘死。

他们盘踞湘赣边界，屡屡杀败前来会剿、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在1931年，于江西瑞金，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皆为毛泽东。

红都瑞金，县委书记名叫邓小平。

毛泽东领导红军，打败了国民党

的数次会剿，打败了四次围剿。到第五次围剿的时候，毛泽东受博古、李德为首的党中央排挤，已经离开红军，游击战术被批判和污名化，李德指挥人数和装备均远远落后于对手的红军，与敌硬拼，“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步步失败，死伤惨重，中央苏区危在旦夕。中央决定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中央红军长征。从江西南部进入广东，往西而去，连闯四道封锁线。湘江一役，血流成河，8万多人剩下3万多人，陈树湘将军率领的“绝命后卫师”为掩护主力红军，血战不止，全军覆没。

博古、李德，还想着继续往北寻找贺龙，蒋介石布下口袋，请君入瓮。忍无可忍，也不能眼睁睁看着革命事业一朝葬送，靠边站的毛泽东站出来，联合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主张西进贵州。

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并且在遵义城内，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之后，博古、李德以及他们的幕后操盘手王明，再也不能左右中共和红军的命运。毛泽东虽然还不掌握中央实职，但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政治军事领袖。

遵义会议之后，四渡赤水，西进云南，“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历尽艰辛，挥兵北上。

徒步走过两万五千里，经过多少子弹横飞、炮弹轰鸣，此中苦难言，唯今一声叹。1936年10月，几路红军全部抵达陕北，那里有一个刘志丹领导的革命根据地。

今天看上去，好像是明知此处有亲人而千里投奔，事实上，中共中央也是杀到此处，收集报纸，方知竟有同志。张国焘、贺龙，纷纷率队来归，最后，天下共产党人，齐集陕北。

当共产党人还想着怎么抵御蒋介石接下来的进攻的时候，日本帝国

主义大举狼子野心，跨越长城，虎视华北，步步紧逼。

此前，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1931年不战而失东北，1932年淞沪抗战迟迟不派援兵，1933年，日军攻占山海关，拿下热河省，兵锋直指北平，1935年，日军以东北的伪满洲国为后方，觊觎华北。被派往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忍无可忍，发动兵谏，逮捕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

中共中央派周来曲折处理，保住蒋介石，迫其抗日，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方知妥协无用，决心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名第十八集团军），下辖三个师。国共军队分工合作，紧密配合，国民党军正面作战，抵御日军推进，共产党军队在太行山和华北一带，深入敌后，袭击歼敌。

在延安的毛泽东写下《论持久战》，预计了抗战的三个阶段。同时，他也辩证地论证了游击战争在抗日大局中的战略地位。抗战几乎毫厘不爽地按照毛泽东的预计发展，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蒋介石从未摆下他的“剿共”心事。抗日初期，要求八路军迅速开赴华北与敌人硬拼，便有借刀杀人之意。之后同意共产党负责被日军重重围困的敌后工作，也是料定共军必被消灭。

1941年皖南事变，原意在逼迫新四军渡过黄河到华北与日军消耗，盘算不成，杀机顿起，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9000余人，大部被歼。

战胜侵略者之后，国人渴望和平，蒋介石摆出和谈姿态，同时一刻不停地“剿共”。

重庆谈判，毛泽东亲入虎穴，万里赴戎机，虽然未能换来万民期望的

联合政府，但共产党人的主张广为人知。一首《沁园春·雪》震惊世人，原来造反的共产党，领导者是个大诗人。

中国的社会精英尤其是知识分子，在阴谋野心与光明磊落的对比之下，越来越认同共产党。边区和抗日根据地之外的人民，由于国民党接收期间的无度搜刮，民不聊生，人心也开始倒向共产党。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当

时共产党有野战军61万人，而国民党有正规军200多万人，蒋介石踌躇满志，“6个月消灭共产党”。谁知共产党越打越精神，而国民党越打越萎顿。以占领城市为目标的国民党兵力日渐分散，陷入了与日军侵华时期同样的尴尬局面，而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衡量成败的共产党，神出鬼没，防不胜防，消灭敌人的同时，兵力日益壮大。最后，通过世界战争史上辉煌闪耀的三大战役，把国民党主力消灭于长江以北，奠定胜局，随后毛泽东下令，“将革命进行到底”，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一路南下，摧枯拉朽。

渡江作战之前，解放军炮击侵入中国内河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表明了新中国决不与帝国主义妥协的决心。共产党人血战20多年，目标就

是回应人民的期待：消灭封建主义，赶走帝国主义，重塑生产关系，让人民不挨饿，国家不挨打，民族有尊严，为独立自主地通往现代化廓清障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国内方定，外患又起，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新生的中国，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直接在战场上交手，将对方逼回三八线以南。这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面对西方强国，第一次实现整体上的军事不败。

100多年后，世界终于看到，中国变了。她虽然依旧贫穷，但她的政府再也不是过去那种忍气吞声、卑躬屈膝的窝囊相，她的军队再也不是过去那种一触即溃、一打就跑的狼狈样，她的人民对国家大事不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与政府、军队结成一体。

共产党人的斗争哲学是，和平是打出来的，越是不怕战争，就越能避免战争。正是因为朝鲜一战，中国解除了百余年来动辄挨打的被动局面，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与节奏，来开始国家的工业化建设。1954年，中国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在步步挨打、受尽屈辱的清朝出生，经历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战争，血流成河的共产党人，深知如果国家不能免于挨打，一切富强愿望都是镜花水月。于是，在最为艰难的六七十年代，中国依然“勒紧裤带”制造出两弹一星，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这个一百多年来饱受欺凌、苦难深重的民族，再也不会被丛林世界里的强者随意蹂躏。

还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先生就提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先生又进一步论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

过去的40多年，中国人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奔向共同富裕的愿景。

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平等的价值是突出强调的。它永远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在社会领域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竞争胜败视为根本性的正义。改革开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蛋糕不断做大，大部分人的生活都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善。与此同时，国家也从未忘记那些陷于贫困的人民，有计划的扶贫始终伴随整个改革开放进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8年时间，近亿人摆脱绝对贫困，全球惊叹。300万名扶贫干部下乡驻村，1800多人牺牲在扶贫一线，除了中国共产党，世界上没有任何执政政会有如此决心，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实现“无人不饱暖”，相反，饥饿才是历史常态。